

論文學之「雅正」與「通俗」

成功大學中文系 王三慶

壹、問題之提出

自五四以來，胡適之先生等倡行新文學運動，創作《嘗試集》^①，並研撰諸白話小說之序論文字及為口語文學追根溯源而撰寫了《白話文學史》^②，凡此種種，無非希望向國人說明，新文學運動所用的文學語言乃是傳統的繼承，並非大逆不道的革命和橫的移植；再者，他也希望推出一些足供新青年學習白話寫作之典範和教材，因此特別推介語體小說及《紅樓夢》，於是奠定了白話在中國文學史上之一席之地。其後，孫楷第著有《中國通俗小說書目》^③，大抵收錄了用白話語言敘述為主之通俗小說作品，兼錄部份淺近文言之作，於是文學史上復有雅正與通俗之分野命題。逮及鄭振鐸先生出版了《中國俗文學史》^④，對於通俗語體和書面雅正的文字，這些原已存在了兩千年，向來少人詰難的問題，終於正式被提出討論，做為文學發展歷史的主流加以描述。由於歷代文學發展史的詮釋權力及喜惡風向往往操縱在文人及掌握政權的貴族手裡，其所立足和取舍的觀點自是一副別樣心腸，而鮮有反對聲浪出現，如今卻在胡、鄭、孫三位的專著中明確的主張和作為文學

① 胡適，《嘗試集》，民國九年，上海亞東出版社。

② 胡適，《白話文學史》，民國十七年六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③ 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民國廿二年，中國大辭典編纂處國立北平圖書館同排印本。

④ 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民國廿七年八月，長沙商務印書館出版。

主流而予以強調和描述，無庸疑問這是對傳統文學觀念提出了新的挑戰，的確饒富興味。因此，本篇不想直接為其下一定義，以其人言人殊，在義界多少會有出入，難以獲得大家一致的認同，只擬從語言角度加以檢討，並提出一些相關問題作為大家思考討論的方向。^⑤

貳、從語言角度論「雅正」與「通俗」之名義

「雅正」之與「通俗」，兩者可是一組相對的概念，在文學創作上有無絕對的「雅正」或「通俗」，原是可以討論的，畢竟這個概念是後設的語言名詞，不是作家創作時原有的決定。只是今日所見的文獻資料中，孔子曾經談到《詩》、《書》、執禮所用的語言盡是「雅言」^⑥，與其它文類使用的語言有所區別；其後詰訓古今異詞的《爾雅》和揚雄撰述的《方言》，則是有鑑於各地語言之別異，而想加以匯通。他們有無統一語言的用心姑且不

⑤ 這裡所說的語言乃指人為廣義的語言，文字不過是語言的記錄符號，其又可分類為自然語言，文學語言又是自然語言的上層話語，凡是具有錦心繡口與精練技巧的口語文學和文字作品都是文學語言的一種和代稱。勿論士大夫之作或民間歌謠故事以及不分階級創作與愛好賞讀的各類文體，盡是文學語言這一層級上面的高層個別結構物之一。每位作家的作品多少都佔有自然語言和文學語言的共通成份和個人特殊成份，組合成為個人的文學作品和書篇，所以要截然劃分通俗與雅正以人以篇以句字而論，都有些微的差別，統而言之是不可能的，畢竟其中只是百分比的差異，不能以百分四十九使用民間群眾的口語創作即屬雅正，也不能以百分之五十一就算通俗，此理淺顯而易明，也是作家之作品或多或少都能受到廣大群眾或部份人士喜愛的主要原因之一。尤其各時代的自然語言已隨時兼程為過去，無法追索或見證，而階級、教育與職業也難再統計與界定，隋唐以來的科舉，鼓舞民間大眾的向學，一旦成功，有幸側身成為士大夫，不成還是蟄伏於民間的文人，幸與不幸而已，豈能就此成敗而論英雄，並作為文學成就的界定和判斷準則。此所以本篇擬就實際的文學發展歷史現象與文學媒介的語言角度，其功能性、作者、消費者等討論的原因之二。

⑥《論語·述而篇》云：「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台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註疏本）第62頁下欄。

論，但是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語言是人類溝通過程中極其重要的工具，其溝通的符號必須是某一族群團體中所約定俗成與共同承認的東西；並受一定時空的限制。因此，它自有一套俗約-----包括內在的規律和外在的形式。如果這套俗約所涵蓋的範圍愈廣，則它的發行區域面積愈大，使用的人口自然越多，相對的溝通更加有效，也必然越發暢行無阻，這在文學術語上名之為「通行」或「流行」。這等情形有如今日美鈔貨幣，隨著美國國力與發行量、經濟的基本面或準備金等條件的具足，而流通至世界各地，並為大家所樂於持有一般，在貨幣學上稱之為強勢貨幣，語言使用上稱之為強勢語言，文學讀物上則謂之暢銷作品。如果它只限於某一特定區域使用，或僅在少數人口間發行，其通行區域必然窄小，那麼，這種幣值拿到各處使用，自然處處碰壁，因為它並不能兌換到等值的貨物，有如一張不能兌現的及期支票。可是當其國力衰亡的時候，自然產生信用危機或變成廢紙一張，如舊台幣及盧布或大清國之紙幣，換不到等值的東西；文學作品也不能受到廣大群眾的喜愛而侷促於某一人群角落中。如果時代的語言一旦發生了變化，作品市場也會受到讀者的唾棄，有如經濟的基本面出現了黃燈，而股票下跌也是很自然的如實反應在市場上。同理，語言使用過於熟爛，失去吸引讀者的新奇感和刺激力，就如紙幣之發行過度，熱錢充斥整個市場，容易造成金錢遊戲，面臨而來的即是通貨膨脹；甚至支票簽發超過自己銀行的存款時，無法兌現到自己期望的獲得，也會發生所謂的信用危機。這種經濟理論和以語言作為藝術的文學，其所以有歷代文體的因革變易，道理上沒有兩樣。文學語言只要脫離地理語言學的空間和階級使用的語言範圍，生命力便受到不少的限制，能否為廣大的群眾所接受，則不無疑問。而其接受力又達到幾許的程度，在在都要從其是否為強勢語言來加以衡量，以英法德和中文各種語言而論，英語系作為母語的不列顛國協或東亞各地的使用漢語，其使用的人口和國家，自然比其它種語言的使用空間和人口來得既多且廣。相對的其它的語言則沒有如此的盛況。所以，當作家個人使用的語言離開地域性、階級性與共時性的語言俗約太遠，自然能夠接受者少，遑論所謂的通俗；如果過分的濫用，

又不符人類喜新厭舊的心理，容易造成文學語言上的陳腔濫調，而被視為「俗不可耐」。一旦大家不能容忍而排斥它的時候，語言上的變易與另作選擇，絕對遲早發生，而舊有的東西自然逐漸沒落，成為陳風絕響，於是不得不另行改發新台幣來取代舊台幣，俗語上謂之「移風易俗」，正式如此。因此，文學史上諸多的問題，從內容到形式，從思潮到作品，無一不受此語言規律之影響而改變，而有新思潮的湧現和新文體的產生。詩而後有詞，詞而後有曲，歷代文學都有各自的語言和文體，說穿了是因為語言失去了它的魅力而隨時變易，索緒爾的歷史語言學和地理語言學中已經很明確的告訴我們，「時空」是語言演變的兩個很重要因素，而使用語言的人類其深層意識更是文學思潮的主宰，索緒爾語言的兩軸理論是文學史上一而再，再而三，迫使文風改變的主要原因。因此，作為語言藝術的文學，只要記錄語言的符號具有藝術性和趣味性，能夠保有新奇感，自然吸引人而討人喜歡，「雅正」與「通俗」並不那麼重要，價值上更無高下之區別。王國維說「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優劣，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寶簾閒掛小銀鉤，何遽不若霧失樓台，月迷津渡也。」^⑦兩者之間，畢竟都有它完美的境界和保有具體內容的詩情語言。

參、文學史上作品在蓋棺論定後的詮釋權

可悲的是亙古以來，即已存在的市場經濟律則機制，往往為大家所忽視，鳥籠經濟的圈圈總成為政權上放不開的經濟教條，以至於扼殺了無數的商業生機。對於文學現象也是如此。按理而言，文學應當取決於廣大的讀者群眾，可是在缺乏市場調查的時代，廣大的讀者總是沒有發言權利的一群烏合之眾。尤其中國古代受教育的水平沒有現代之質高量廣，能說又能寫者畢竟有限，以至於歷代文學作品的詮釋，其主導權往往操控在少數文人手中，

^⑦ 王國維，《人間詞話》，參見唐圭章，《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10月二刷），第4240---4241頁。

而不受當權群貴主導者幾希。在已往文學仍須依靠文字記錄而流傳的時代，對於當日習慣用口語傳達的一般大眾，又沒有錄音機及錄影機或以數位錄存的輔助下，往往備受忽視而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縱使一般民間口傳文學有機會被傳載成爲文字，然而已經大爲走樣；有幸落到袞袞諸公的文人手裡，其觀點是何樣的一副心腸與能夠代表多少作者和讀者的真實意見，不無令人存疑。就以收集全國圖書訊息的歷代經籍志或藝文志，其纂修主編者盡是一群士大夫階級；而掌管圖書的也是類似尚書省的秘書或集賢殿裡的官員，他們具有足夠長遠眼光的還是少數，能夠取法周朝官吏的采風，從事收集鄉野村夫的作品或接受一般平民大眾的意見畢竟不多。若是真正注意到雅俗文學問題的文評家或文論家，而敢獨抒一己看法，並爲廣大的民間群眾說話，以與傳統文學相抗衡者，恐怕都要到了晚明以後才出現。

事實上，創作絕對是一件個人情感的抒發，他不需要徵求大家的默許或贊同；作者的個性越強，往往越能顯示他的與眾不同。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文章也是如此。當創作使用的語言與群眾的生活結合成一塊，則其愈能感動一般大眾，作品自然能夠得到大眾的喜愛，也更加的通俗。老嫗能解的白居易詩和有井水處都能歌柳詞，在在說明他們的作品不只得到文人的模仿喜愛，連下階層的平民大眾或歌女村嫗，一樣的喜愛吟詠歌唱，這就是所謂的通俗，也證明了他們使用的語言是那麼和群眾如此的接近。縱使有些人也會取笑批評他們的俚俗，卻不妨礙他們作品的偉大，寫給掌握語言文字的人能夠看得懂並不難，反而讓不容易掌握語言文字的廣大群眾個個都能接受，則需一定的程度和水準。不過，需要注意一點的是，所有通俗的作品未必都是好而受歡迎的文學作品，這點還是要從語言藝術的角度來加以衡量。

肆、從文學發展和作者角度看「雅正」與「通俗」的目標導向

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爲無書、多窮

理，不能極其至，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詩者，吟詠性情也。盛唐諸公惟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⑧

誠然，文學的本質與教育、知識無關，詩心也非盡出於教育上的培養和知識上的獲得而樹立，所以文學的創作不盡然是出於讀遍萬卷書、行經萬里路，具有豐富知識的人所能個個下筆。由於語言文字只是一種符號，它是意義的傳載工具，有所指，也有其能指，更何況文學的本質並不全然在語言文字之上，而是出於錦心繡口，存有詩心者才能體驗其中三昧。所以，《詩經、十五國風》未必全出於廟堂袞袞諸公，卻有大半出於政府派遣學者奔赴民間採擷無名氏的作品而來。

從文學史上的發展規律和真象來看，《楚辭》是屈原流放於沅湘之間，看到祭神的民歌，然後加以參與創作。樂府如果沒有〈孤兒行〉、〈苦寒行〉等諸民間作品，是否會出現大批的士大夫文學，則不能不令人存疑。儘管從古詩十九首到唐詩，有大量的五七言詩作出現，上至於宮體、宴饗，下至於田園、邊塞，幾乎是文縐縐的士大夫之作，然而王梵志詩還是風行到了宋元之交，白居易也要盡量使用平民化的語言，奠立他在唐詩的地位。凡此，在在說明過去我們接受的作品讀物，大半是屬於熟練駕馭文字的知識份子所記錄，一般都以雅正文學去看待它；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一股泓大而潛藏的暗流，今日雖然已經隱沒不見，其在當日卻是充斥廣大社會各階層，只因沒有商機和缺乏發表機會，所以被載錄下來的百不存一罷了。但是這種書面文學和口語文學並存的現象，在中國文學史上應是司空見慣，可惜流傳於後世者太少，有的只是一鱗半爪，稍多的資料出現則需等待經濟和教育條件的具足

⑧ 嚴羽，《滄浪詩話》，《歷代詩話》（台北、藝文印書館，民國80年9月五版）第443頁。

以後才能有所改變。

隋唐以後，在經濟上因中亞絲路各線的開通和海運的發達，造成國際商業貿易的繁興，當時兩京都有上百萬的人口集中，城市經濟逐漸形成，改變農業社會自給自足的生產形態，這等情形引發了中產階級大量人口的出現。在教育史上，則是受到宗教信仰所影響，產生了大量的寺學教育，補足官方州縣學校和私人教育的不足，促使民間讀書識字的人口大量的增加。再者，科舉制度打破了薦舉的用人制度，一般平民可以通過考試制度而成爲公卿，在利之導引下，教育繁興，寫作人口不再侷限於少數貴族和知識份子的家族手裡。尤其在民間寫作人口的參與下，多元文化價值於焉出現，造成文學作品的多樣性，更使文學語言更富有變化性。

在宗教信仰下，佛教對於知識份子的影響已非小可，但是其在廣大群眾之間所掀起的流風更是非凡。佛法僧謂之三寶，法在於經，讀經、抄經都是僧尼之修業要務，因此從道安以來以迄僧祐，不斷的集結整理佛教經典，使藏經閣成爲寺廟圖書館；而六朝以來舉行水陸和功德齋會的風氣愈來愈盛，齋會中唱作祈願齋文乃爲必要條件，而唱作齋文者往往比只行法會的僧人收入齋儼更爲豐厚，成爲寺學教育發達的另一原因。再者，六朝的倡導，到唐宋的俗講說經，伴隨佛教的流播而風行全國，若說其傳播對象是針對知識份子，不如說廣大的民間庶人才是它的主要宣導目標。尤其爲了吸引大量的信徒，引進了印度和中亞域外的文學菁華與技巧，匯入了中國文學的洪流當中，促使通俗文學一日千里，更加的繁衍和興盛。因此，向達在〈唐代俗講考〉^⑨「長安寺院與戲場」一節中提及當時的俗講盛況，足以讓我們想像佛

⑨ 按其文云：「錢易南部新書云長安戲場都集中於慈恩，小者在青龍，其次薦福、永壽。尼講盛於保唐，名德聚之安國。是大夫之家入道，盡在咸宜。此處所舉，除咸宜一寺不知所在外，其餘如慈恩、青龍、薦福、永壽、保唐、安國六寺全在長安城的東部，即所謂左街也。保唐寺原名菩提寺，在平康坊，會昌末始改此名。故錢易所述，當是大中以後的情形。唐代長安寺院，凡國家有大事追健行香，以及春秋佳日士大夫遊賞多聚於此。平時以法相莊嚴，繪畫精好，當有不少遊人，所以戲場

教對於通俗文學的影響力量。但是這都是假借宗教信仰之名而作為吸引信徒的手段，真正目的還是在意於經濟，尤其各種齋懺水陸大會中，自動施捨錢財是其中不可缺少的項目之一，造成古今中外寺廟保有龐大寺產，這是不爭的事實。所以，韓愈〈原道〉所爭執的理由表面看來是爲了傳統儒道的衰替，其實是爲了國家生產力的降低與消費者的增多而不平。不只佛教如此，道教亦然。在佛道二教的相互激揚之下，針對廣大群眾的民間通俗作品絕對不會像過去一般，被忽略而視若無睹，畢竟他有一定的商機和市場。所以從敦煌變文到宋元的話本小說、戲劇，事實上是朝向以民間大眾爲消費目標的創作，不是爲了少數知識份子的感動而書寫，這點是六朝前後作品最大的分野處。

既然作品是爲廣大的民間大眾而寫作，則其取材絕對不會侷限於廟堂中上層階級的生活，而是具有民間生命力的大眾生活素材；其所使用的語言也非純粹可以鏤於金石，爲傳之久遠而打算的雅正文字；而是夾雜很多群眾階級本色的生活素材和當前使用的口語。因此，從作者的角度論「雅正」與「通俗」文學，不可就作者的階級和作品的文字來論述，而應就其寫作的素材和使用的語言來作爲判斷依據。更重要的是其寫作時候的消費對象，是爲了一己及少數知識份子的排遣心情，消愁破悶；還是爲了多數讀者的興趣，這才是「雅正」與「通俗」分野的重點所在。

伍、從接受讀者的角度談「雅正」與「通俗」文學

既然讀者的興趣才是「雅正」與「通俗」文學分野的重點，則其內容必非廟堂文學，更非知識份子所關注的課題，也許只是對於一般人生的喜怒哀樂或芝麻綠豆類的食色瑣事；以及勞動之餘，休閒活動而產生的副產品。如上古時代的歌謠、神話、傳說、諧笑等，其產生背景原本甚爲複雜，可是大

蒼萃。宗教的境域之外，並成爲民間遊樂消遣的中心。」（參見《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1981年，台北明文書局重排三聯書店版）

半是在這種不為任何目的服務的創作，勿論源於模仿或起於勞動消閒，絕對合於人類天然的本性和環境的需要。也因如此，在農業社會人口散居的莊園中，此等休閒活動並無市場經濟價值，既難以集中消費人口，也沒有專業化的職業訓練，只是業餘性質的消遣性活動而已，其目的既在娛神，也是為了娛己，使人神兩相共樂。

也因這種勞動階級的餘興之作，缺乏市場經濟價值，沒有積極創作的誘因，才導致今日文學僅存一鱗半爪的形式，而且盡是文人的好奇記錄。^⑩這些文學記錄一旦脫離它的生活環境，失去原有的說話模式及樣態，則其生存條件便已備受威脅。所以必須改變其生態環境後，才有可能生存。

唐傳奇是作者有意識創作小說的階段，作者每將其作意寄寓其中。^⑪然而這只是文人溫卷的副產品，古文運動的餘波，還不是通俗口語化，為群眾讀者而寫的東西。至於唐代的俗講變文，源於六朝的唱導講經的通俗化，完全是寺廟與信徒間的餘興，這是以信徒群眾為導向的創作，因此自然使用民間一向熟悉的通俗話語和生活素材。當時遊樂和集會場地概以寺廟為中心^⑫，使通俗文學融入宗教性的活動中，也是必然的結果，加上佛、道二教積極的推衍，作為吸引信徒的花招，好讓信徒樂於自動捐獻，這種情況在敦煌文獻以及目前各種宗教活動中處處可見。^⑬而唐代各種節日的形成，益使活

⑩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九流緒論》（台北、世界書局，民國 52 年 4 月初版）云：……漢《藝文志》所謂小說，雖曰街談巷語，實與後世博物·志怪等書迥別，蓋亦雜家者流，稍錯以事耳。……子之為類，略有十家，昔人所取凡九，而其一小說弗與焉。然古今著述，小說家特盛，而古今書籍，小說家獨傳，何以故哉？怪力亂神，俗流喜道，而亦博物所珍也；玄虛廣莫，好事偏攻，而亦洽聞所昵也。……至于大雅君子，心知其妄，而口競傳之，且斥其非，而暮引用之。

⑪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全集》（台北、谷風出版社，民國 78 年 12 月台一版）第九卷，第 73 頁。

⑫ 錢易，《南部新書》，《歷代筆記小說集成·宋代筆記小說》（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 年）第十八冊，第 483 頁云：『長安戲場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龍，其次在薦福、永壽。尼講盛於保唐，名德聚之安國，士大夫之家入道，盡在咸宜。』

⑬ 日·圓珍，《佛說觀普賢菩薩行法經記》，《大正藏》卷五六云：「言講者，唐土

動加繁加密。從諸多押座文和解座文中不時可以看到如下叮嚀聽眾的句子^⑭：

「今日講經功德分，願因逢便早歸來」

「我擬請佛恐人坐多時，便擬說經，願不願，願者檢心掌待著。」

「適來和尚說其真，修行弟子莫因巡。各自念佛歸舍去，來遲莫遣阿婆嗔。」「今朝法師說其真，坐下聽眾莫因循。念佛急乎歸舍去，遲歸家中阿婆嗔。」

至於一般的知識份子聽講說話的情形也成爲風氣，如劉謐〈廓廊賦〉云：

『坐上諸君子，各各明君耳，聽我作文章，說此河南事。』（《初學記》引）

元稹〈酬白學士代書一百韻詩〉：『翰墨題名盡，光陰說話移。』下自註云：

樂天每與予遊從，無不書名屋壁，又嘗於新昌宅，說『一枝花話』，自寅至巳，猶未畢詞也。^⑮

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四〈貶誤〉條：

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觀雜戲，有市人小說，呼扁鵲作徧鵲字，上聲。予令任道升字正之。市人言：『二十年前嘗於上都齋會設此，有一

兩講：一俗講。即年三月就緣修之，只會男女，勸之輸物，充造寺資，故言俗講（僧不集也云云）。

⑭ 以下文句參見潘石禪先生，《敦煌變文集新書》（文津出版社，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十二月版）第2、4、8、10頁。

⑮ 《全唐詩》（台北，明倫出版社影中華書局排印本，民國60年10月），第4520頁。

秀才甚賞某呼扁字與徧同聲，云世人皆誤。』

可見唐代從士大夫到一般平民，聽講說話非常的盛行，而高力士為唐明皇晚年能夠開心，其所作所為之事，「或講經論議，轉變說話，雖不近文律，終冀悅聖情。」則更不必說了。

在此情況下，完全是以聽眾為主體的講說的確改變當時以知識份子和作者為中心的文學風氣。而市場上的競爭情勢，從韓愈〈華山女〉^⑩一詩便可看出端倪：

街東街西講佛經，撞鐘吹螺鬧宮庭。廣張罪福資誘脅，聽眾狎恰排浮萍。黃衣道士亦講說，座下寥落如明星。華山女兒家奉道，欲驅異教歸仙靈。洗妝拭面著冠帔，白咽紅頰長眉青。遂來陞座演真訣，觀門不許人開扃。不知誰人暗相報，訇然振動如雷霆。掃除眾寺人跡絕，驂駟塞路連輜輶。觀中人滿坐觀外，後至無地無由聽。抽簪脫釧解環佩，堆金疊玉光青瑩。天門貴人傳詔召，六宮願識師顏形。玉皇領首許歸去，乘龍駕鶴歸青冥。豪家少年豈知道，來遠百匝腳不停。雲窗霧閣事恍惚，重重翠幕深金屏。仙梯難攀俗緣重，浪憑青鳥通丁寧。

毫無疑問，「通俗」文學之正式登上中國文學舞台，並保有大量文獻乃就此開端，並且完全受市場經濟所主導。

因此，宋代以後，消費性的大眾娛樂和商品化的說唱創作，跟隨著人口的集中、大城市的出現，市民教育與經濟的興起等種種原因，於焉產生，開展了職業化的說書唱賺和劇團活動。這種以娛樂大眾為職業，用以謀生的積極態度和唐代以前可有可無的消極性創作絕對不同。如果他的技巧不夠專業化，說的盡是老掉牙的題材，而毫無變化，則如何吸引聽眾？如何用以謀

^⑩ 同上，第 3823 頁。

生？也唯有在市場導向的情況下，為著迎合聽眾的心理，多樣和富有變化的題材乃是必走的途徑。同時，為了彌補市場大量的消費和聽眾追新求奇的心裡，自然出現了專業撰寫話本或劇本的書林書會等團體組織。從宋代留存的幾本文獻材料，如《東京夢華錄》、《武林勝紀》、《汴梁錄》、《醉翁談錄》等都可以看出當日說話演出的概況，而其演出場地上至於宮廷·私人府第·寺廟·瓦子勾欄·茶肆酒樓，下至於露天空地·街道與鄉村廣場，處處都曾留下他們的足跡。為了引徠觀眾，則出現類似廣告的招子，更有開場等人和吊人胃口的懸念結局，以及消費者付費的商業模式。同行間，為了互相觀摩技巧，出現了仿效唐代以來盛行的各種行會社團組織。這種表演情勢，造成宋代通俗說話唱賺的整個形式和結構內容等藝術特色，除了語言聲音有其條件要求外，還要穿插敷演，使用道具、布景或插圖，更要隨時加上一段歌唱，用以娛樂大眾。

再者，因為雕板印刷術技術的發達，可以大量的生產文本，使通俗作品傳播的更為廣遠；不像唐以前的抄書方式，只侷限於簡短的記錄和少數人之間的流通，這是兩者最大的不同。通俗作品在大量生產下，其消費成本自然降低，對於宋元以迄明清以後通俗作品的流通，影響甚大。以至於殘障人士可以藉演唱通俗作品用以謀生，如明姜南《洗硯新錄》云：

世之瞽者，或男或女，有學彈琵琶，演說古今小說，以覓衣食。北方最多，京師特盛，南京杭州亦有之。^①

而消費群的讀者大眾當中，婦女喜愛通俗作品者更多，如明葉盛《水東日記》卷廿一〈小說戲文〉條即云：

今書坊相傳射利之徒偽為小說雜書，南人喜談如漢小王光武、蔡伯

^①明、姜南，《洗硯新錄》，《說郛續》卷十七。

嗑筈、楊六使文廣，北人喜談如繼母大賢等事甚多。農工商販，鈔寫繪畫，家畜而人有之。癡騷女婦，尤所酷好，好事者因目爲女通鑒，有以也。^⑮

這種情形對於向來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婦女，的確是一件福音，而地下出土的《明成化說唱詞話叢刊》十七種、《金花女》等佚失作品等也在女墓中作爲陪葬文物而被發現，縱使連極端雅化的《牡丹亭》、《紅樓夢》，也存有不少的女性讀者，足見通俗作品對於女性知識文化之提升和教育之促進普及，影響非常的深遠。甚至擴及國外，如日本枕草子之讀者即以婦孺爲中心，1895年M·Courant的《韓國書志》也談及漢城有小說出租店，趙泰億（1675--1727）的《西周演義》跋，就提及他母親閱讀該殘卷。尤有甚者，如李德懋〈士小節〉云：

諺翻傳奇，不可耽看，廢置家務，怠棄女紅，至於與錢而賞之，沉惑不已，傾家者有之。

今萬重（1637--1692）《西浦漫筆》云：

今所謂三國志衍義者，出於元羅貫中，壬辰後，盛行於我東，婦孺皆誦說。

蔡濟恭（1720--1799）爲其妻吳夫翻《女四書》序：

近世閨閣之競以爲能事者，惟稗說是崇，日加月增，千百其種。

凡此種種文字，在在證明這類通俗作品之消費群和讀者群不再侷限於士

⑮ 明、葉盛，《水東日記》（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73年7月排印本）卷廿一〈小說戲文〉條。

大夫階級的兩班人員，而是以廣大民間群眾以及婦孺為消費對象的文學創作，才是所謂的通俗文學，而與雅正文學有所區別。

陸、結論

「雅正」與「通俗」是一組相對的概念，它原是後設的語言名詞，不是作家創作時原有的決定。作為語言藝術的文學，只要記錄語言的符號具有藝術性和趣味性，能夠保有新奇感，自然討人喜歡，無所謂「雅正」與「通俗」的分野，更無價值上的高下區別。可悲的是亙古以來，文學作品即已存在的市場經濟律則和機制，往往為大家所忽視，以至於歷代文學作品的詮釋，其主導權力幾乎操控在少數文人手中，於是只重「雅正」，而忽略「通俗」。若從文學發展史來看，新的文學體裁其產生大半淵源於民間，然後才有知識份子的文字記錄和參與創作，儘管今天都被視作雅正文學；然而不可否認的是自古以來潛藏著一股弘大暗流的民間文學，卻是當日社會各階層的喜愛，只因被載錄下來的百不存一罷了。

隋唐以後，交通的開發，經濟型態的轉變和教育的逐漸普及，加上造紙印刷技術的改進和城市人口的集中，產生了更多的通俗文學作品，也留下大批的文獻材料。在大量生產的情況下成本降低了，同時也使大眾更有能力消費；而消費大眾的增加又刺激了生產，尤其在佛道二教信仰下，為了招徠信徒，爭取施捨錢財，難免出現競爭，使唱導和俗講變文吸收融合了中外文學之精華，改變以作者或少數知識份子消愁破悶為中心的文學創作模式和文學風氣，移轉到以廣大消費群眾為消費對象的創作。這種轉變完全受到市場經濟導向的影響，以娛樂大眾為職志，成為藝人謀生的專門行業，而非可有可無的業餘工作。於是從表演場地到廣告花招以及專業技巧的要求，促使通俗文學有了飛躍的進步和藝術上的長足發展。同時，因為通俗文學的流布，間接的普及民間知識的流通，尤其向來缺乏教育機會的婦女，在足不出戶的時代，往往藉著閱讀小說與觀賞戲劇，作為消遣漫漫長日與自我進修的工具，足見其功能不可小覷。